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西方激进思想中的 生命政治

Xifang Jijin Sixiang Zhong De
Shengming Zhengzhi

王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西方激进思想中的 生命政治

Xifang Jijin Sixiang Zhong De
Shengming Zhengzhi

王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激进思想中的生命政治 / 王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1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203 - 0524 - 2

I. ①西… II. ①王… III. ①政治哲学 – 政治思想史 – 西方国家

IV. ①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405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西方激进思想的历史进程	(9)
第一节 西方激进思想的兴起	(10)
一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10)
二 兴起的历程	(16)
第二节 西方激进思想的高涨	(21)
一 19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世界传播	(21)
二 20世纪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33)
第三节 西方激进思想的分化与当代格局	(39)
一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39)
二 20世纪70年代之后激进思想的当代格局	(45)
第二章 尼采哲学的身体转向	(50)
第一节 虚无主义与生命的兴衰	(51)
一 奴隶道德的谱系学：否定生命的旧道德	(51)
二 欧洲哲学的终结与颠倒：肯定生命的未来哲学	(61)
第二节 身体哲学与谱系学	(68)
一 谱系学的第一原理：“以身体为引线”	(69)
二 身体与权力的谱系学	(73)
第三章 福柯论生命政治的诞生	(80)
第一节 生命政治之母体：生命权力	(80)
一 权力研究	(81)
二 生命权力的历史生成	(86)

第二节 生命政治之诞生框架：治理技艺的逻辑变化	(92)
一 国家理由治理技艺：人口的出现	(93)
二 自由主义治理技艺：自由和安全的核心原则	(103)
第四章 哈特、奈格里论生命政治与生命政治生产	(110)
第一节 从帝国主义到帝国	(110)
一 第二国际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及其启示	(111)
二 帝国主权的生命政治本质	(123)
第二节 生命政治的实体性生产：非物质劳动	(129)
一 非物质劳动的理论背景	(129)
二 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框架	(135)
第三节 生命政治的主体性生产：多众	(138)
一 主体性生产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大纲〉： 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139)
二 帝国内部的主体性生产：多众	(145)
第五章 阿甘本论赤裸生命与主权权力	(149)
第一节 赤裸生命的生产：主权的功能	(150)
一 赤裸生命	(150)
二 现代政治与赤裸生命的共生	(155)
第二节 赤裸生命的空间：主权的例外	(159)
一 例外状态的概念分析	(159)
二 一场隐匿的巨人对话：关于例外状态的争论	(168)
第三节 救赎：对抗主权的弥赛亚	(175)
一 弥赛亚主义与法律	(175)
二 弥赛亚降临的时刻	(180)
参考文献	(188)
译名对照表	(195)

导　　言

1968 年，法国爆发了一场反抗资本主义的新型革命——五月风暴。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家们为之欢欣鼓舞，认为它是针对日常生活总体的（列斐伏尔）、要求人的真正自由（萨特）、也是一种来自基层的革命（马尔库塞）。但仅仅一个多月，这场新左派运动^①在法国当局和老左派势力的反击下迅速转为低气压进而彻底失败。随着五月风暴的逝去，新左派运动陷入低潮。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福柯在对生命权力的研究中，提出了至今最完善的权力技术形式——生命政治。当今一些左翼思想家借用福柯的概念，通过生命政治对当今资本主义进行着激进而又公开的批判，使激进思想呈现出新的局面。但对于生命政治，不同的思想家有不一样的说法，究竟该怎样理解生命政治？笔者愿同读者一起，展开生命政治的整体研究，探讨西方激进思想视阈下的生命政治。

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引起了当今一些左翼思想家的探讨，使人们对生命政治的兴趣与日俱增，尤其是两个重要文本推波助澜：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Empire）和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的《牲人：主权权力

^① 新左派运动的创立者是那些不满于传统左派政党的知识分子。新左派与传统左派的区别在于：新左派回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异化问题而不是剥削问题；新左派相信社会主义不限于政治和社会革命，而必须消灭日常生活中的异化；新左派认为，文化领域内的变革先于社会和政治的改造；新左派的座右铭是行动而非组织；新左派认为社会改造的推动力不是无产者而是新型技术工人、青年知识分子和社会边缘群体。（英格里德·吉尔舍-霍尔泰：《对 1968 年 5 月/6 月危机的解释》，见汪民安主编《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6 页。）

和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the Bare Life)。前者引发人们去关注其书中对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阐发；后者本身就是针对福柯的生命政治而写。在国内学界，生命政治主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不仅大量的经典思想家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如莫伟民、赵伟翻译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诞生》，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的以生命政治为主题的《生产》（第七辑）等；而且还涌现了为数颇丰的聚焦于具体思想家、著作的研究成果。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对生命政治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按人头梳理为线索的研究方式。比较多的是对阿甘本和福柯的生命政治的研究，其中有：美国学者米格尔·法特在其文章《法与生命的神圣性——阿甘本生命政治简介》中，指出阿甘本之于生命政治的创新之处在：他提出政治对于生物生命的统治是通过法律来实现，而法律反过来被神圣化和主权的概念重新阐释。北京外国语大学姚云帆的博士学位论文《阿甘本“牲人”概念研究》廓清了阿甘本“牲人”(Homo Sacer)概念的逻辑结构和其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生成方式。在台湾地区，有两篇优秀的研究阿甘本例外状态的学位论文：一篇博士论文——柯朝钦的《例外状态的统治与救赎：论阿冈本的两种例外状态模式》，一篇篇幅接近博士论文规模的硕士论文——薛熙平的《例外状态：阿冈本思想中的法与生命》。对福柯生命政治的研究主要有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法律·规训·治理》，作者从法哲学视角出发解读了福柯的著作《生命政治的诞生》，指出福柯的生命政治提醒人们，必须关注治理限度问题，避免法律成为规训化权力的工具；在《权力对自由的法律控制》中，作者分析了法律下生活的现代人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抵抗。

第二，以学术流派阐述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张一兵老师研究了以朗西埃为代表的后马克思思潮的生命政治哲学，在他看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朗西埃与齐泽克、阿甘本和巴迪欧成功的互文引用，说明已建构一种后马克思思潮的全新的资本主义批判尺度和另类先锋话语。其中朗西埃的生命政治研究关注了身体化的感性围观控制层面，它是要改变过去政治理学份额计算的方式，构成了与作为隐性构序结构的治安的根本性纷争；还有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政治研究：刘怀玉、陈培永老师指出，哈特与奈格里不是孤军奋战的两个人，他们属于意大利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

义流派。这个流派曾进行共同的实践，分享相似的概念。《帝国》中将生命政治与此流派提出的“非物质劳动”相结合，论证了反抗帝国的主体力量的形成——多众。

第三，以福柯的生命政治为参照系的比较研究方式。如一些学者比较了哈特、奈格里在《帝国》中的生命政治与福柯的生命政治，认为哈特和奈格里对“生命政治”的探讨已完全脱离了福柯的论述轨道，他们所讨论的“生命政治”实际上只是对福柯所说的微观规训权力作更深入地开展而已，根本没有福柯所理解的人口统计或出生率等这些与“生命政治”技术相关的内容。汪民安教授比较了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指出阿甘本补充了福柯的不足，在福柯那里，身体是被权力干预的场所，而在阿甘本看来，身体不仅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因为它同时是权利起源的场所。身体一旦获得公民身份，就能获得权利。但难民因为没有公民身份，是赤裸生命，因而没有任何权利保障，成为名副其实的“牺牲人”；美国学者凯特·吉拉尔探究了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权力问题，质疑阿甘本对福柯的重新阅读究竟是对福柯的批判，还是对福柯的极端不忠？一方面，对福柯而言，生命权力的假说包含一种对权力，尤其是对把握权力方式的重新界定，从而在与古老的统治权判然有别的领域把握生命权力；与之相反，阿甘本在统治权中探寻生命权力。另一方面，福柯是在对牧师权力和治理术的反思中，将他的主题落实在主体并开启了自我技术问题对生命权力的重新阐释；阿甘本则将眼光放到福柯早已弃置的君主主权与法的领地。

国内外学术界为生命政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缺乏整体性的视角，即很难找到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来串起关于生命政治的诸多流派、诸多思想家、诸多作品。本著作拟弥补以上不足。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五月风暴”的失败和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西方激进思想陷入低谷。但当代的左翼思想家通过生命政治对当今资本主义展开了猛烈批判，使激进思想呈现出新的局面。鉴于生命政治与当代西方激进思想的这一内在关联，本著作试图以激进思想为理论视阈，从整体上展开生命政治的研究，以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

二

西方激进思想是本书研究生命政治的理论视阈。激进思想指一种对现

状抱有彻底否定态度、急切希望对之进行根本变革的学说和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未建立时，激进思想表现为对封建制度的拒斥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前导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西方激进思想兴起的酝酿和准备。当资本主义已经落实为西方现存的社会制度时，激进思想则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拒绝和对社会主义的构建上。社会主义学说以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传播，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表明西方激进思想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进入高涨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与马克思相关，激进思潮呈现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并存的格局。这些思潮有些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则和根本观点，有些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架中最重要的原则，有些甚至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它们无一例外地承袭了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今天，一些激进学者通过生命政治来开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激进思想复兴。

尼采的身体哲学启发福柯建立了身体与权力的谱系学，构成福柯生命政治的哲学前提。在尼采之前，欧洲哲学传统是柏拉图主义的意识哲学，意识哲学占据哲学的支配地位。意识哲学的道德目的是否定生命的，尼采因此开启了哲学传统的身体转向，试图建构肯定生命的未来哲学，实现对欧洲哲学的颠倒。尼采的身体哲学在生命政治研究中的地位主要有两点：第一，实现了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和对欧洲哲学的颠倒。虚无主义的表现是否定生命，但生命缘何被否定？尼采在道德谱系学的考察中发现了生命衰败的奥秘：生命的衰败是奴隶道德的凯旋之后果。奴隶道德是否定生命的，因此要建立肯定生命的、从身体出发的新道德。同时，由于作为奠基欧洲哲学偏见的柏拉图主义也是以否定生命为道德目的，尼采因此提出了“权力意志”概念，以此实现对整个欧洲哲学的颠倒。“权力意志”作为尼采建构的未来哲学的核心概念，其实就是生命本身，就是身体。第二，确立了谱系学的第一原理是“以身体为引线”，并启发福柯建立了身体与权力的谱系学。一方面，在吉尔·德勒兹的眼中，尼采是谱系学家，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用“差异感和距离感替代了康德的普遍性原则以及功

利主义者钟爱的相似性原则”。^① 同时在福柯看来，谱系学的真正对象不是起源，而是出现和出身，后两者都与身体相关。福柯接过尼采的身体概念，并透过谱系学，将身体与历史连接起来。身体被历史刻写，历史则摧毁和塑造身体。至此，尼采的主动生产性的身体被福柯改造成被动铭写性的身体。换句话说，尼采的身体可变性和不稳定性，使福柯将权力的落脚点放置在身体之上，透过身体揭露其被权力改造，继而论述了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诞生。

福柯是阐述生命政治的重要的激进思想家。他最初的关于生命政治的理论分析，是在 1976 年《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的第一卷最后一章。这两部著作都分析了西方权力机制的一次重大变革：生命权力对死亡权力的替代，并提出个体的解剖政治和人口的生命政治作为生命权力的两极。生命权力是福柯权力研究的逻辑结果，这一概念要通过对治理的研究得以展开。或者说，治理模式是福柯权力研究，确切说是权力关系研究的场域。通过对治理术的考察，福柯发现，治理的最根本对象是人。对人的治理或人的自我治理，这种观念的源头不是在古希腊，而是主要来自希伯来的牧领权力。牧领权力经过基督教的改造后形成牧领制度。牧领制度不同于用来强迫人们服从律法或君主的技术，也不同于教育孩子的方法或说服人们的窍门，它是治理人的艺术，是治理术的源头、形成和建立的胚胎。牧领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作用于移动中的、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的羊群；它也是一种善意的权力和个人化的权力。这些特点说明牧领权力是生命权力的起源，生命政治是古老的牧领权力的现代回应。综观福柯对生命政治的探究，概括而言：第一，生命权力是生命政治诞生之母体。生命权力即管理生命的权力，它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古老的、救赎式的牧领权力。生命权力自 17 世纪以来发展出两极不同的且非对立的权力形式：针对肉体规训的技术形式和针对人口调整的技术形式，后者即生命政治；第二，生命政治也是马基雅维利以来治理技艺的逻辑变化结果。福柯把“治理技艺”理解为政治主权运转中的治理实践之合理化。生命政治

^① [德] 吉尔·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则指以人口和生命为对象，通过对人口进行积极的调节、干预和管理等手段，以达到提升整个人口的幸福和生命质量的目标。“自由主义”因而进入他的视野。自由主义是国家理由在18世纪中期转向一个新的方向，它不是有别于国家理由的他物，相反，其原则恰恰是“为了国家理由的维护、全面发展和完善”。^①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核心是自由和安全，必须确保生命和生活的安全。由此，生命问题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下被提出，生命政治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诞生。

当代左翼思想家哈特、奈格里接过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但对其进行重新界定。安东尼奥·奈格里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他对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在实体性意义上进行了重新界定：生命政治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向全社会的延展，同时它也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断裂和对抗。^②迈克尔·哈特也强调过，重要的是区分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这两个术语。生命权力是通过创造生命形式来统治主体、统治社会的权力形式，但它没有提供抵抗的可能性。生命政治和生命政治生产则是有可能决裂并创造另一种可能的力量。可见，哈特、奈格里是将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把握到生命政治社会生产的本体内容，从而超越了福柯的结构主义认识论缺陷。这部分论述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帝国的非物质劳动，二是帝国内部生长出来的多众。哈特、奈格里基于列宁的逻辑，指出既然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没有发生，那么到来的就是资本的新的全球统治秩序——帝国。帝国主权是网络权力，其核心是生命政治本质；基于福柯的局限性，哈特、奈格里以“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使社会生产与生命权力内在关联起来；最后，受马克思的启发，哈特、奈格里建构了帝国内部的反抗力量。对革命主体的界定，奈格里在其早期是“社会工人”，到了《帝国》则是多众。多众，作为从帝国内部生长出来的革命主体，只有在生命政治的主体性生产的意义上才能获得深刻内涵。

当今最著名的意大利左翼思想家阿甘本也修改了福柯的生命政治。阿

^① [法]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② [意] 安东尼奥·奈格里、[美] 亨宁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社会转型——内格里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2期。

甘本的生命政治来源于福柯和阿伦特的融合。在他看来，一方面，福柯通过性的历史揭示了其中起作用的权力的展布，并成功转向生命政治的研究，即把人的自然生命纳入权力的机制和算计之中的完善的权力技术形式。但令人遗憾的是，福柯未能研究现代生命政治的典范场所。另一方面，尽管阿伦特非常清晰地描述了极权主义国家与集中营之间的关联，但她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分析却欠缺生命政治的视角，事实上，与她的分析刚好相反，集中营并不是极权主义统治必然产生的机构，而是极权主义的前提条件。集中营是赤裸生命的领域，正是通过它，极权统治才成为合法和必要。“赤裸生命”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sacred life）这一概念于是成为他们理论聚焦的透镜。赤裸生命就是 *zoē* 和 *bios* 分裂的产物，是存在于政治领域并且是 *zoē* 在其概念化的时刻进入城邦这样一个事实的产物。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制造生命政治的身体是主权者的原初活动。”^① 如此，阿甘本以主权逻辑修正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赤裸生命被主权权力借由例外状态的方式生产出来，这表明了生命与主权的连接。例外状态，简言之，法透过将自身以悬置的方式设定为无法，而将生命纳入治理。他关注本雅明与施密特之间关于例外状态的争论，其最终目的是试图以本雅明来超越施密特，构想一种对暴力与法之间关系的弥赛亚主义翻转。一方面，弥赛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其与法律的特别关系，确切说，是以弥赛亚精神对犹太律法的废除；另一方面，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是对保罗的“剩余时间”的重复，即是“某种属于历史的时间，同时又使之终结的东西”。^② 简言之，阿甘本将论域从当代政治伦理延伸到宗教领域，追寻“弥赛亚精神”，试图建构一种不为暴力所捕获生命的未来政治。

三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哲学或社会理论，其核心是批判。马克思并非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第一人，但他批判理论的独特性和历

^①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1998, p. 6.

^② [意] 吉奥乔·阿甘本：《潜能》，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288页。

史进步性在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以及经由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带来的全人类的解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分裂成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两种不同的路线。在这两种路线之外，还有一种激进的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进而提供新的解放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也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为了纠正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强调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集中于阶级意识问题和文化霸权问题，开启了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批判道路。随着青年马克思手稿的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直接宣称马克思主义就是人本主义，要求直接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统治，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物化和异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是总体性逻辑，理论图景是总体的人，但阿多尔诺以“否定的辩证法”瓦解其总体性的话语，开启了一种异质性的人学话语。当代左翼学者着眼于人的现代生存状况，阐发了生命政治，这亦隶属于人本主义批判。

总而言之，在激进思想的视阈下，生命政治本质上是人本主义批判，它通过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揭露，试图打碎对人的统治形式，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同时，生命政治是主客体同一的辩证逻辑向差异性逻辑转向的结果，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主客体同一的逻辑，即一种历史性、总体性和本质主义的逻辑，它试图揭示历史的内在矛盾，并提供一种解决方案；相反，生命政治遵循差异性逻辑，即共时性、差异性和反本质主义的逻辑，它反抗科学话语权力，要求创建谱系学。正是在谱系学计划下，福柯着眼于权力关系，再次提出生命政治，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新的权力技术，由此引发了当今对生命政治的关注和探讨。尽管如今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思想资源，但它仍为反霸权的知识实践和争取权利的话语实践提供着思想动力。因此，问题依然是：如何获得自身解放，社会历史如何朝向更为自由、公平和美好的明天？

第一章

西方激进思想的历史进程

激进思想，顾名思义是一种激进的或关于激进主义的思想。哲学上的“激进”一词起源于英国。大约 18 世纪 20 年代，哲学派系中的激烈分子，很骄傲地自己使用了这个名词。^① 后来，仍是在英国，“激进”第一次被用在政治上。“一般认为 C. 福克斯在 1797 年要求实行‘激进的改革’时首先使用这个词，改革内容包括大大扩大公民权。此后，‘激进派’一词被作为一切支持议会改革运动的人在内的概括名词。”^② “激进主义”一词，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这一术语也许可以界定为一种对现有的机构、制度等持批判性疑问态度，并主张对那些已无存在的合理理由的机构制度等进行改革或干脆抛弃之的倾向，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完整、全面的政治信念，倒不如说是一种立场；其实践内涵随激进分子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而发生变化。”^③ 总之，激进或激进主义本质上都指一种彻底改变现状或拒斥它的倾向。因此，激进思想就是一种对现状抱有彻底否定态度、急切希望对之进行根本变革的学说和观点。作为一种否定并变革现状的倾向和思想，在资本主义制度未建立时，激进思想表现为对封建制度的拒斥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在资本主义建立后，则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拒绝和对社会主义的构建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随着“五月风暴”的失败和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的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已经终结。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与马克思主

^① 叶龙彦：《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9 年版，第 41 页。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四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77 页。

^③ [英] 戴维·米勒、[英] 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26 页。

义相关，激进思想呈现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并存的当代格局。

第一节 西方激进思想的兴起

激进思想，作为一种否定、变革现状的态度和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未建立时，它表现为对封建制度的拒斥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作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前导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解放运动，构成为西方激进思想的酝酿和准备。在兴起的具体历程中，伏尔泰是起始人物，而后经过法国百科全书派，最后则是法国大革命。

一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一) “启蒙”概念的考察

“启蒙”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法国。无论是英文 enlightenment，还是德文 Aufklärung，都是对法语 Lumières 的翻译。早在 1733 年，杜波斯神父 (abbé Dubos) 就使用了“Siècle des Lumières”(启蒙时代)；1750 年，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第一篇论文》中也使用了它；第二年，在《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现之前问世的《序言》中，编者达朗贝尔认为当前的 18 世纪是启蒙运动达到最高阶段的世纪，并将之称为“哲学世纪”。在《序言》中，达朗贝尔首先考察了近三百年来精神生活：正如文艺复兴运动始于 15 世纪中叶，在 16 世纪中叶有宗教改革运动的高潮，在 17 世纪中叶产生了笛卡尔哲学导致转变了人们整个的世界观，同样，18 世纪中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继而，他将 18 世纪称为哲学世纪：“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 18 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之快，似乎预示着一种更为巨大的转变即将来临。唯有时间才能告诉人们这场革命的目标、性质和范围，后人将比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它的缺点和功绩。……我们的世纪

因而被人们特别称为哲学世纪。”^①

在德国，Aufklärung 这个术语正式出现在 1784 年关于“启蒙运动 [Aufklärung] 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讨论上。1783 年 12 月，著名神学家和教育改革家策尔纳（Johann Friedrich Zöllner）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n Monatsschrift*）上发表题为 “Ist es ratsam, das Ehebündniß nicht ferner durch die Religion zu sanciren?”（《以后不经宗教而认可的婚姻行得通吗？》）的文章。文章抨击了那种不经宗教而纯粹根据民法来规定的婚姻，维护在启蒙风潮下被挑战的教会证婚制度。并指出当时人们在启蒙的名义下已产生了心灵的混乱，但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得到解答。在一个脚注中，策尔纳提出：“什么是启蒙？这个就像什么是真理一样重要的问题，在一个人开始启蒙之前就应该得到回答！但是我还没有发现它已经被回答！”^② 策尔纳是柏林星期三学会的成员，那是一个秘密的、与《柏林月刊》过从甚密的启蒙运动之友协会。在策尔纳要求给出启蒙的定义后不久，1783 年 12 月 17 日，J. K. W. 默森，一位对科学史感兴趣的著名外科医生，也是腓特烈大帝的私人医生，在星期三学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对公民的启蒙做点什么？》，催促该协会的成员界定“什么是启蒙”。1784 年 5 月，同样是星期三学会成员的门德尔松作了一个演讲，随后他以这个演讲为基础，在《柏林月刊》上发表《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Über die Frage: Was heist Aufklaerung?”）。同时，这期还发表了迄今对策尔纳的“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最著名的回答——康德的《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aerung?”）。

在英国，虽然有启蒙运动的现实，却直到很久以后才有表达它的名词出现。1789 年问世的康德论文的第一个英语译本没有用“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这个名词，而是用“在启蒙的”（enlightening）或“启蒙过的”（enlightened）代替它。根据《牛津英语辞典》的记录，“启蒙运动”作为 Aufklärung 的翻译，最早出现在 J. H. 斯特林 1865 年关于黑格尔

① [德]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 页。

② [美] 詹姆斯·施密特：《导论》，见 [美]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及爱德华·开尔德 1889 年关于康德的书中。^①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第一次出现有关启蒙运动的词条，则是在 1929 年的第 14 版中。^②

（二）启蒙运动的首要特质：批判的理性

什么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指出，它是“用来描述 18 世纪的一场重大思想、文化运动的术语，这场运动的特征是深信人类知识能够解决现存的基本问题”^③。学界一般认为启蒙运动是从 17 世纪末期开始，在法国百科全书派达到高潮，结束于法国革命。但也有一些学者主张认为启蒙时代结束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 1789 年，另一些学者将启蒙运动的下限推迟到整个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结束的 1815 年。尽管启蒙运动确切的起止时间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他们一致认为，启蒙运动的首要核心特质是理性。

首先，对 Lumières 的考察可得知，它等同于理性。Lumières 在法文中的意思是“光明”，但 17 世纪的知识分子借由古代哲学用它指代理性或真理。在希腊哲学中，一些重要术语〔如 theoria（理论）、eidos（本质），“理念”等〕最原始的意义就是指“看”，“看”是离不开光的；在中世纪哲学中，奥古斯丁继承了普罗丁（Plotin）的“自然之光”这一概念，但赋予它新的神学意义，将“自然之光”解释为对上帝的话语的领悟；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将“自然之光”等用于“理性之光”（lumen rationis）。他在《神学大全》中将“神圣之光或上帝之光”与“理性之光”区别开来，并认为“理性的自然之光”分有了“上帝之光”或“神圣之光”；在近代哲学中，笛卡尔受到阿奎那的影响，用“自然之光”表示理性。^④ 笛卡尔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指出，“如果有人想真心实意地探求事物的真理，他就不应选择某一专门的科学；因为所有科学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他应该想想如何增

^① [美]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齐安儒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注释第 141—142 页。

^② 同上书，“序言”第 8 页。

^③ [美] 彼得·赖尔、[美] 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 页。

^④ 汪堂家：《“启蒙”概念及其张力》，《学术月刊》2007 年第 10 期。